● 张曙光 周建明 编译

以军事力量谋求绝对安全

—美国新军事革命与国防转型文献选编

YIJUNSHILILIANG
MOUQIU
JUEDUIANQUAN

国防大学出版社

以军事力量谋求绝对安全

——美国新军事革命与国防转型文献选编

张曙光　周建明　编译

国防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对美国国防战略界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预示着国际安全环境的一个新时期到来。在这个以美国安全战略设计为使命的圈子内，对于这个新时期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躁动。特别是70年代以来新一轮“军事革命”，不断地展现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力量对比从未有过的优势，更令国防战略界的信心大增。以新军事革命为基础，“美国需要即刻实施国防战略转型”一时间成为华盛顿圈内外、军内外的热门话题，其日益膨胀的影响已经从战略界、理论界、舆论界乃至对外与国防政策决策层。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2001年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的研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展开的。它也构成了新世纪美国国防战略的主旋律。使世人感到震惊的“9·11”袭击事件以及小布什政府由此发动的全面反恐等新情况，不仅没有减弱美国未来战略设计的原动力，实际上加大了华盛顿长期国防转型的推动力。[1]

美国坚定不移推行着的国防转型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其到底会在哪些方面对未来国际安全态势产生影响？在美国国防转型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发展到底会出现哪些变数？这是每一个关心世界局势和中美关系发展的人都不能不关注的问题。要对这些重

---

[1] 关于此点，参考布什政府2001年10月31日公布的《2002年四年防务评估》、布什于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的“美国将要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讲话。此外，参考周建明、张曙光著：《美国安全解读》附件4（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大战略问题有准确的了解，一个可靠的途径是解读美国国防战略界近期的研究报告。

为此，我们挑选了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自1989年以来公开发表的68份麦克耐尔系列报告中，1999～2000年期间完成的第60、61、62和63号，以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2015》，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作战》教义共6份研究报告，以编译成较能系统地反映美国在新"军事革命"条件下的国防转型思考的文献汇编。

这些研究报告是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为美国新世纪安全战略服务而产生，并非偶尔为之的零散成果。自1997年美国国防部首次出台《四年防务评估［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简称QDR］》后，美国联邦行政（白宫）与立法（国会）即将国防评估惯例化——每四年一次。由于考虑到计划于2001年完成的QDR恰遇美国总统换人、政府换届，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H·希尔顿将军提议并通过行政立法确认，委托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成立一个专门"2001 QDR"研究小组。所选的四份报告都与该工作小组的工作有关。按要求，这些报告"旨在提出问题，找出选择，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各军种和下届新政府就2005～2025年防务战略、判断常规力量规模的标准和武装力量的结构等三个领域提供建议"①。显然，这些报告的分量不同于一般的学术之作，而具有专家论证与政策建议的功用。

其次，这些研究报告所反映的意见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战略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研究的专家，大都来自与政府部门具有密切联系的研究机构，有的直接来自于军方，而且并不

① Sam J. Tangredi, All Possible Wars? Toward a Consensus View of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2001—2025, McNair Paper No. 63,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ovember 2000), "Forward", p.1.

仅仅限于美国。对他（她）们的选择，主要依据其专业水平与研究能力，而不是与美国政界或某个部门的疏密度。如受委托撰写“美国的RMA与盟国关系调整”的法国人罗宾F·莱尔德，长期为华盛顿和巴黎防务和商务战略顾问。他（至2000年）发表过500多篇有关美欧共同防务专题的文章，出版了19本涉及国际安全战略的专著，是国际战略界公认的美国和欧洲国防高新技术、防务和战略政策的知名学者。莱尔德的合作者霍尔格H·梅伊，是来自西欧的另一位学者。他担任设在德国波恩的战略分析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德国航空航天和防务公司的顾问。梅伊曾在西方各种报刊上发表过大量关于未来军事战略文章，并编写过关于国际安全政策的丛书。由此可见，授命参与“2001 QDR”研究的专家，大都是国际安全研究某个次领域的“重量级”人物。

再次，这些研究报告从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美国国防战略界关于未来战略思考的共识，并非“边缘的”或个别意见。由于为“2001 QDR”而进行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授命”色彩，各个研究小组都能够接触到公开的或不公开的近期美国政府内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文件、众多的智库以及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而研究小组的工作，是对这些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找出共识。如研究“2001～2025国际安全环境”的萨姆坦J·坦格里迪，便根据所确定的标准选择了36份关于未来环境的研究，这些发表于1996年到2000年之间的研究代表了“大多数对国家防务问题有兴趣或有关系的组织机构的观点”。他对这36份研究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比较，以寻找就一些相同议题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从这一比较中，找出了16点共识和9点分歧。几乎所有的报告都参考了大量的第一与第二手资料。

为了方便读者，下面我们将所选文献中的一些有关美国未来国防战略转型的概念、观念、原则与思维逻辑，作为“导读要点”予以提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新军事革命是美国国防转型的动力

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防转型的重要动力来自于“新军事革命”。这场由军事技术革命所引起的作战方式、军事理论，以及美国整个国防的转型构成了美国这次国防战略调整中的基础部分。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麦克耐尔第61号研究报告“将明天的战场照亮”可以说是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中，对新军事革命以及可能带来的美国军队的作战和国防建设方向上最具体，也最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目前美国正在进行的国防转型的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在美国自70年代开始的一场“新军事革命”中，“信息技术”的研发与军事利用成为其“国防升级”、“军备建设”、“战略资源重组”新阶段的标志。尽管对新一轮的RAM是否真正到来，其真实的战略含义到底是什么，意见并不一致，但在谈及RMA时，下列几点共识总是并提到：

未来战争胜负的充分条件是“信息技术”；

未来战场已由“空-地战场”转为“电子战场”；

未来主要军事威胁来自于“信息化”甚至“核生化”的“非常规、非对称打击”；

未来战争的主要方式是“低烈度高科技军事冲突”，而非“主要区域战争［简称MTW］”；

未来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是“造成与对手在掌握、使用信息技术水平的最大不对称”。

美国这一轮的所谓军事革命，实际上始于1970年开始的对精确制导武器（简称PGM）的开发和改良。而RMA的第二阶段则是国防部在80年代对指挥、控制、通讯、电脑、情报、监测与侦察（简称C4ISR）系统的大规模整合与提升。在此基础上，“2001

QDR”研究小组建议，美国RMA的下一个方向应该是编织一个覆盖面广、密度甚高的“全球天网”，并以美国国防部为中心建立所谓“系统中的系统”，使未来的实际交战空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亮透彻，以便美国的战争指挥中心实时地掌握战场的情况，在万里之外运筹帷幄；依此，美国在21世纪的战争中，将完全占据“知己知彼”的战略高地。

按照专家预测，这种军事革命将会给主导“冷战”的常规作战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化：由短兵相接变为捉迷藏；由作战平台中心转为作战网络中心。一个能够照亮作战空间的网，至少能够为未来国际武装冲突中的美国军队提供4项对手所难以攀比的优势，它们包括：

有了精确武器——这类武器的制导有从发射装置或内置传感仪能够转变为外供信息的潜在趋势——看见目标就等于能消灭它；

尽管目前存在对付精确制导武器的防御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谁能加强看与打之间的联系，谁就拥有战场优势；

由于详细绘制地图和全球定位系统(GPS)已成为确定目标方位的要素，防范和杜绝对手获得GPS能力便具战略意义；

一个由不断增加的众多种类传感探测器构成的网络，意味着数据（在网中）综合能力将转换成更加重要的战斗力。

无疑，随着信息技术对美国武装力量的不断注入与加深，“天网”本身将自动帮助各种作战部队更有效地作战。据此，专家们认为，“天网”将以两种基本方式变革美军的军事实力：第一，照亮交战空间将使五角大楼得以看见并进而通过从远距离打击或以信息支持当地作战人员来击败敌人。这样，美国国家指挥中枢（简称NCA）便能对付比今天的典型对手更凶恶、更狡猾的敌人。第二，有功能足够强的网，NCA就可以帮助实际作战人员弄懂复

杂混乱的冲突格局，使美国武装力量能更确切地应付常常呈现为混沌的冲突局势。

“天网”的出现和它在支持新作战方式中的作用，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原则和组织结构同样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开发脱离式作战，它的焦点不在控制领土上，而在取得打击、消灭对手（特别是他们的重装备）的效果上，它有一个由扫描、区分、筛选和打击构成的作战周期，以力求达到远距离、即刻打击、不留踪迹。

探索两种新型的多国联盟作战网络：一种建立在一个由各国的C4ISR装置拼接而成的共用网之上的“联合行动”；另一种则利用这个网的导视作用来增加受困盟友的防卫能力，而非美国军事力量的直接介入。

迫使对手在面对一个透明世界难以进行常规入侵时，只能选择泥淖战——特别是在复杂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的低强度冲突如“维和”行动中，美国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冲突区最大的稳压控制。

上述“天网”的军事战略意义与要求，也决定了“天网”建设的进程。因为，如果说获取有条理的知识是军队的新轴心的话，则“天网”必须无处不在，整合如一并广泛联通。脱离式作战需要关于战场的详细现时信息，同时保持牢固的连接。美国对新多国联盟的支持，使“天网”对盟国部队不是高不可攀。泥淖战要求“天网”能够从“何物在何处”中辨认出“何物”。

专家们认为，通过构建“天网”以带动未来战争形态与性质的根本改变、确保美国的绝对战略优势不仅十分迫切，而且非常可行，迫切性是由于美国今天的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态势所然；尽管对手众多且日趋繁杂，几乎所有的对手都处于相对于美国的信息绝对劣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技术在经济全球化背

景下的快速扩散，一个未经整合的美国国防信息优势必将逐渐弱化。因此，美国必须以超前眼光进行战略性国防转型，建立“天网”势在必行。而建设“天网”的可行性则取决于两个关键的操作性条件：一是技术不成问题；二是花费并不太大。

第二．美国新“军事革命”条件下的盟国关系

“新军事革命”是一个美国的概念，它是以美国的军事技术革命所带动的军事革命为内容的。但是，一旦美国进行军事革命，就对美国的盟国——特别是主要盟国——提出一项战略挑战，即在面对未来国际安全环境时，如何从美国军事力量发展中为自己寻找机会和预测风险。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麦克耐尔第60号研究报告“军事革命：（美国）盟国的视角”就深入地探讨了这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华盛顿战略界关于21世纪美国国防战略的共识是：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全球性大国，它的军事手段是全球性的，而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生死攸关的是所谓“环欧亚美地带”。为此，美国所追求的新军事革命，就要求重新设计与主要盟国的关系。由此，专家们明确要求美国采取所谓“区域网络”战略，而非传统的“结盟”战略，这是因为：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国能够照搬美国新一轮军事革命的做法，也难亦步亦趋地跟着美国国防战略设计走；欧亚地区的盟国至多也只能通过参与美国的军事革命，以加强他们实现地区目标和满足建立网络要求的能力。

在冷战结束之初，欧洲人和美国人之间马上显出了力量投放和安全相关性上的差距。冷战的40余年中，西欧盟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大规模的陆上军事威胁以保卫德国。美国不是一个欧洲大陆的国家，它需要通过空中和海上把兵力投放到欧洲和亚洲以“捍卫”它自己和盟国的安全利益。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拥有庞大的全球性海军。美国的空军也是围绕着在战时阻止苏联的军队以便地面部队有时间从海上增援而装备的，欧洲力量则是围绕着

庞大的德国军队而组建的。德国的欧洲盟国的武装力量，只是为了以各种方式阻断一旦苏联进攻德国以及欧洲南北两翼的路线而装备的。因此，冷战时期从战略上看，欧洲盟国不需要力量投放能力或远洋海军——而拥有力量投放能力的国家，只有法国和英国，大体上是它们早年为支持各自的殖民帝国而进行海外行动的遗产。

冷战结束后，西欧几乎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都面临着如何适应新形势下国际安全现实的问题：西德的军队正成为统一后德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法国从征兵制转向军队职业化，并把发展海外投放力量作为国防建设重点；英国正在进行根本性的战略防务再审查，包括热衷发展英国“战略海军”以适应新的国际战略形势。

在美国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军事革命的条件下，未来美欧战略同盟关系的重新设计与塑造，必须依此大背景。目前，专家们认为，可以有“上、中、下”三种不同的方式可选择。

上策——全面入网。根据对未来战争的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美国主要盟国应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与美国军事革命相关的国防战略力量，并将这些力量——如机动优势、精确作战、后勤集中管理、全方位保护和信息优势——与美国相应的力量整合起来，以期能够向美国联合力量提供和平时期实施“接触”行动的后盾，在威慑和防止冲突和在需要作战时，提供优势的行动选择。确立结合各种新技术使之成为全面的优势的能力是美国军事革命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是任何单个欧洲国家所难以企及的。因此，一个完全“入网”的欧洲联盟才是美国所真正需要的欧盟。

中策——有限整合。在主要盟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不允许其国防力量与美国军事力量完全整合的条件下，另一个选择是当美国需要确立全面优势的时候，主要盟国得以在美国的战略框架内进行参与和合作，并在需要和可能情况下，在冲突区域内提供特殊行动的能力。如英国和法国可以发展联合海上打击力量，美国、法

国和英国可以整合各自的巡航导弹发射系统，以对付那些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利益产生的威胁目标。此外，欧盟各国的军事指挥部可以将各自的信息和通信系统连接起来，统一指挥相互联接的联合力量，以便担负不需美国参加的国际维和行动。

下策 — 独立发展。作为欧洲经济重建的一部分，欧洲可以利用民用信息和通信系统以单独发展只属于欧洲的军事革命。这样的欧洲式军事革命将是更广泛的欧洲技术基础设施重新设计的组成部分。尽管一个独立的欧洲安全与防务体系将最终形成，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军事合作将会由于新一轮军事革命而渐行渐远。专家们认定，目前的现状恰恰反映了这种选择趋势：西欧主要国家均以某种形式把建立机动力量和投放力量作为改造他们军事力量的基本色调，尽管对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和要求什么并未取得任何共识。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计划改造军事力量使其能提供战略投放力量，但对如何使这种力量与美国的相应力量相整合并服务于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以及战略设计，缺乏明显的考虑与安排。

毫无疑问，美国战略界将敦促欧盟国家“全面入网”作为塑造新型同盟关系的关键。为此，专家们提出的需要通过政治运作加以解决的问题包括：

欧洲各国在重铸军事力量时需要分别和美国及其他盟国达成协议。因为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具有对军事革命做出独立反应的经济科技能力和政治意愿；盟国之间，特别是跨大西洋的相互配合进行的军事革命是西欧军事革命的核心。

将欧洲高技术产业的改造和新的军事技术发展结合起来，是美国与盟国面临的共同战略挑战。随着欧洲的国防系统转型，欧洲国家必须认识到由美国主导的技术产业的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军事技术领域的战略选择，并依此重新设计他们采购体制、力量结构、研发过程和与产业界（包括欧洲、美国及亚洲的产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界）的工作关系。

需要说服盟国在部署新军事技术时，能够明确地将美国的全球战略目的考虑在内。在选择防务计划时，盟国要能够在“哪些威胁最突出、如何改造现有的军事结构、以更有效地对付长期的威胁和满足长期的要求”等方面与美国的国防转型取得一致。

力求解决西欧国家防务政策所面对的“不完全主权”挑战。由于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被盟约要求以出让部分主权为区域安全利益服务，美国要在未来盟国“网络”关系中协助主要的西欧国家如何在不完全主权环境下制定其国家的防务政策，如何在不完全主权环境下有效地将对经济和军事改造的财政支持结合起来。

上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盛顿国防战略界对美国在追求新军事革命的条件下如何调整盟国关系的心态。这种心态一方面出于美国急于推进军事革命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专家们对美国与主要盟国之间在军事技术、国防组织和对全球化反应能力与意愿上不断加大的差距的忧虑。被列入亟待改进的差距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包括：

系统差距。美国为了发展一种可以追求全面优势系统，就必须帮助参与其中的盟国得以发展各自特殊的以及可组合的能力。如果两个系统之间的差距不消除，美国只能成为盟国无法配合的孤家寡人。换句话说，美国为其全球力量设计的军事革命如何能和旨在满足地区需要的欧洲军事革命相结合，应是华盛顿国防转型所不得不解决的战略议题。

组织差距。发展联合力量所要求的通讯和信息系统以及和这种系统的联接是美国与盟国相互作用的关键。美国与盟国组成的联合部队要进行共同操作，就不仅仅是盟国买美国装备和赶上美国，更重要的是能实现系统之间的连接。

与战略伙伴的差距。全球化条件下的高科技产业的全球战略

伙伴关系是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要素。美国与全球的防务工业也需要铸造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参与盟国间军事革命的美国核心盟国——主要是西欧和日本——正针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进行根本性改造。为了在未来20年间构建一个适应美国军事革命的所谓"西方盟国"，美国的主导作用将是它确保美国未来战略优势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

简言之，这些研究强调，在美国和欧洲军事力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技术差距，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欧洲尽力赶上美国的问题，而是美国军事和欧洲安全与发展战略重新设计互相脱节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在于构思出一种盟国间可以展开的军事革命，即一个考虑在盟国防务和高技术产业间发展实际战略伙伴需要的军事革命，以提高未来美国与盟国组建任何形式的联合部队的战斗效率。

第三．美国新"军事革命"与"非对称威胁"

90年代后期，在推动美国考虑国防转型的多种因素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冷战后美国所面对外来威胁的新的判断，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提出了"非对称威胁"。在为2001 QDR进行研究的工作中，"非对称威胁"或"非对称战争"即被列为美国未来国防战略的首要课题之一。它要考虑的问题包括：什么是"非对称威胁"？美国将做怎样的战略调整才能稳操"非对称战争"的胜券？事实上，自从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正式提出"非对称威胁"后，美国政府内外有关安全战略的研究报告便频繁地使用非对称威胁这一概念。本书选译的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的麦克耐尔第62号以"非对称威胁"为题的研究报告，是美国国防战略界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总结与归纳。

关于如何界定"非对称威胁"或"非对称战争"，美国军方早期的定义是："在利用美国弱点的同时，敌人可能使用大大不同于传统的美国军事行动模式，试图威慑或削弱美国的力量。"此后，

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出台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指出非对称威胁来自“敌人使用出乎意料的或非传统的方法来威慑或削弱对手的力量，同时通过难以预料到的技术或创新手段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手的弱点”[1]。麦克耐尔第62号报告认为上述定义都没有充分解释“非对称性”的含义。据此，它的定义为：

“使用低级的战术或可作战性力量集中袭击美国的国防薄弱环节，实现非均衡效果，通过打击美国的意愿来实现非对称行为者的战略目标。”[2]

如果对上述定义展开分析，“非对称威胁”至少包含如下5个要点：

对抗双方安全利益的不对等，是处于劣势的一方试图对对方实施“非对称性”打击的前提。

对抗双方实力的不对称，是实力弱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追求创新方法以弥补自己实力不足的动机，这是“非对称威胁”形成的逻辑基础。

追求“非均衡效果”是实施“非对称威胁”的终极目标，使威胁实施者所投入的资源与其实际得以实现的战略目标之间极为不对称。

“非均衡效果”的实现依赖于行动所带来的心理要素，它是决定非对称行为者采取行动来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

非对称战争并不等同于外部敌对势力（包括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对本土的攻击，对本土的攻击只是非对称战略攻击的

---

① Kenneth F. Mckenzie, Jr., Asymmetric Warfare, McNair Paper No. 62,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pril 1999), Chapter 1, pp. 1-2.

② Kenneth F. Mckenzie, Jr., Asymmetric Warfare, McNair Paper No. 62,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pril 1999), Chapter 1, p. 2.

最极端的、最具潜在危险性的表现。非对称方法存在于各种层次的战争和战场上。只要战争尚未结束，只要为了解决战争的外交仍在进行，弱方就不会放弃非对称攻击方法。

概括起来说，当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利益时，通过寻求战略层次上心理上非对称效果的攻击方法就会受到弱势国家的垂青，而不管使用非对称方法的破坏烈度如何。

麦克耐尔研究报告指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正在面临着六种具有非对称性的威胁。它们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信息行动、有选择性作战观念和恐怖主义。每一种威胁都在战略、作战和战术层次上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表现。依据这样的非对称威胁类型，该报告又考察了美国传统军事以及为国防提供基础服务的重要系统和设施存在的潜在弱点。在此基础上，报告列出下列10种来自外部的针对美国安全利益的一系列非对称威胁，并对其危险度及可能性做了评估：

威胁使用核或生物武器攻击美国本土（相对危险高、相对可能性高）；

对美国本土发起信息战袭击（相对危险中、相对可能性高）；

在冲突地区，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攻击美国之外的主要作战国家或盟国军队，以图分裂联盟（相对危险高、相对可能性高）；

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战略部署系统（相对危险高、相对可能性中）；

在冲突地区用信息战（包括高空电磁脉冲）袭击美军或联军（相对危险高、相对可能性高）；

选择不利于美军或联军行动的不同交战空间（相对危险高、相对可能性高）；

使用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反进入措施（相对危险中、相对

可能性高）；

古代武士战术（相对危险中、相对可能性高）；

对美国本土发起化学武器攻击（相对危险低、相对可能性高）；

难以预料的威胁（相对危险尚难预计、相对可能性高）。

有趣的是，尽管该研究报告对上述可能针对美国的种种“非对称威胁”都做了相当详尽的场景化的描述和评估，但却未对美国应如何改进对付非对称方法的能力提出具体的建议。在评估了美国现行反防“非对称威胁”计划的现状基础上，报告直率地批评道：“我们缺乏关于怎样组织非对称防御而制定的可以接受的单一概念，在现行计划执行中缺少部门间协同。”[1] 因此，报告提出三个提升美国反防“非对称威胁”的原则：

将美国与盟国的弱点最小化；

着重强调美国与盟国特有的反防“非对称威胁”力量以强化总体威慑；

将非对称效果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基于这三原则报告建议，美国未来反防“非对称威胁”必须将制止类似“珍珠港袭击”作为基本目标。

在新千年之初，美国的利益、影响与存在可以说无所不在，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不尊重、损害别人利益的方式出现的，而这种“无所不在”也决定了美国国防本质上的弱点，以“非国家行为体”发动的、具有典型的非对称威胁特点的“9·11”恐怖主义

---

[1] Kenneth F. Mckenzie, Jr., Asymmetric Warfare, McNair Paper No. 62,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pril 1999), Chapter 1, Chapter 5, pp.1—11.

袭击，在美国战略界深入讨论非对称威胁的情况下发生了。它不仅验证了非对称威胁已成为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形式之一，也充分暴露了美国在防范这种威胁上的弱点。现在，美国已经将遏止、防范、战胜“非对称威胁”提升为长期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但是，尽管有着世界最强大国防力量的美国，却仍然风声鹤唳。非对称威胁将是美国心理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该报告提出的最后结论颇具哲理性：在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上，只有成为过去式的大国，才能看到非对称威胁的终结。

第四、国防转型为未来战争做准备

今天，美国已成为支配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但明天，美国仍然能够保持对国际安全事务操控的“独霸”地位吗？除了由于美国从打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胜出而产生的“实力的傲慢”，对美国“高处不胜寒”的深深担忧，以及对未来美国安全环境的“居安思危”，大体反映了美国国防战略界的基本“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情感氛围中，美国战略界十分注重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评估，力图通过描述当今国际冲突所表现出的发展趋势，推测这些趋势将在未来如何演进和变化，以及模拟变化与演进过程中将对美国全球化了的安全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危险与机遇。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麦克耐尔第63号报告“所有可能的战争？ 2001～2025未来安全环境的展望”是一份以新现实主义战略理念为框架，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标，对未来安全环境进行评估的研究报告，从此后所发表的《2001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份报告在对未来威胁的评估上影响甚大。

该报告在研究方法上非常有特点 为了归纳出美国国防战略界对2001～2025年度内国际安全环境的预测的共识和分歧，研究者收集了1997～2000年间有关此课题的300余份公开发表与内部使用的文献，并对文献的结论进行了归纳与对比，目的是反映出“多数”与“少数”、“主流”与“非主流”意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